

# 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略论

陆扬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件大事。讨论这个话题, 涉及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引入、中国本土阐释传统的梳理, 以及中国自身阐释学话语的形构过程。国内较早引介西方阐释学理论的当属朱光潜对但丁诗学的介绍, 而但丁诗学可上溯到作为现代阐释学前身的阿奎那的《圣经》阐释学说。在中国, 阐释学经历过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之辩。自世纪之交汤一介等人提出建构中国的阐释学这个命题, 论者蜂起。近年, 张江提出的“让阐释学说汉语”, 亦引来各界关注。当代中国的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能否以及怎样互动? 让阐释学说汉语意味着什么? 文学阐释学又当何论? 这一切最终指向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建设问题。

**关键词:** 当代中国阐释学; 方法论; 本体论; 汉语媒介; 文学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 I0-02; B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6) 04-0172-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 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 回望过去的 10 年,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 是尤其值得一提的一件大事。它不复是亦步亦趋跟风西方, 而是在学术命题、学术标准和学术话语方面, 走出了自己的路, 令人刮目。

## 一、从朱光潜谈起

阐释学 (hermeneutics) 通常也译作解释学、诠释学, 从最初作为《圣经》阐释的学问, 到今天泛指一切阐释行为的实践和理论, 已两千多年。西方自古罗马晚期到中世纪, 《圣经》几乎是唯一的主导意识形态, 其需要阐释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从实践角度看, 《圣经》记述的事件和人物, 本身每每具有矛盾性。如《创世记》挪亚方舟的故事中, 先写到上帝耶和华对挪亚说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方舟。” (6: 19) 挪亚当时照办了。可是一转眼, 耶和华又吩咐挪亚道 “凡洁净的畜类, 你要带七公七母。” (7: 2)<sup>②</sup> 这里耶和华言语的确凿意义, 究竟当如何理解?

**作者简介:** 陆扬,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 美学、文艺学。

<sup>①</sup>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第 15 页。

<sup>②</sup> 《圣经·旧约》, 上海: 中国基督教两会, 2003 年, 第 7-8 页。

飞鸟走兽到底是各带一公一母上船，还是要分门别类，按需取舍？还是所有活物都七公七母带上方舟？由此可见阐释之必需。早期的《圣经》阐释理论主要分为寓意解经和字面义解经两个传统。所谓“寓意解经”（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其前提是以言指物，而所指之物进一步发挥符号功能，指向更深层的意思。如圣奥古斯丁在其《论基督教教义》中，就举例《出埃及记》中摩西把树丢在苦水里，苦水顿时变甜（15-25）；《创世记》里雅各拣起石头当枕头（28-11），以及亚伯拉罕以公羊献祭，替代儿子以撒（22-13）等情节里，其中的树、石头和公羊就都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符号，因为它们指向了其他意义。就此而言，即便是字面义，也要当作寓意义来解读。

国内较早介绍这一寓意阐释理论的，可推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中对但丁诗学的介绍。在写到但丁的时候，朱光潜以“诗为寓言说”为题，引用了但丁《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的一段话。斯加拉大亲王是但丁流亡维洛那时的庇护人，但丁将未完成的《天堂》篇先给小斯加拉，并以拉丁文附上一信，以作题解，日期当在1319年左右。此信究竟是否出自但丁手笔，后代有不同见解，但其中诗有字面义、寓意义、道德义和秘奥义四种阐释的说法，在但丁的其他文献如《飨宴》篇中，亦有同样的阐发，故可推论这是但丁本人的诗学观念。朱光潜引了但丁的以下文字：

为着把我们所要说的话弄清楚，就要知道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单纯的，无宁说，它有许多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单从字面上来的，第二种意义是从文字所指的事物上来的：前一种叫做字面的意义，后一种叫做寓言的，精神哲学的或秘奥的意义。为着说明这种处理方式，最好用这几句诗为例：“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太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如果单从字面义看，这几句诗告诉我们的是在摩西时代，以色列族人出埃及；如果从寓言义看，所指的就是基督为人类赎罪；如果从精神哲学的意义看，所指的就是灵魂从罪孽的苦恼，转到享受上帝保佑的幸福；如果从秘奥的意义看，所指的就是笃信上帝的灵魂从罪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永恒光荣的自由。这些神秘的意义虽有不同的名称，可以总称为寓言，因为它们都不同于字面的或历史的意义。<sup>①</sup>

所谓“寓言”即 allegory，在基督教传统里，是指《旧约》中的记载都是预言了《新约》中耶稣的事迹，反之《新约》中的每一言，都能够在《旧约》中找到相对应的预演，所以又被译成“预表”。以“寓言”统摄“字面义”后面三种“精神义”，即寓言的、道德的、秘奥的，也就是彼岸世界的意义，是说字面义是以言指物，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后面三种寓言义，意味着被指的事物进一步发挥符号功能，成为能指。考虑到本文不是在基督教语境里写作，照搬“预表”这个译名无异于刻舟求剑；另，“寓言”一名容易将读者引向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一类意思，故而本文将 allegory 译作“寓意”。如但丁上文所言，字面的意义以外都可以叫作寓言的意义，它们是字面义背后的精神义。朱光潜出版《西方美学史》上卷是在1963年，就其所介绍的但丁的“诗为寓言说”从基督教神学中脱颖而出而言，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朱光潜不失为在中国言说文学阐释学的一位先驱。

## 二、建构中国阐释学的设想

阐释学中国话语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的设想。1998年3月，汤一介在汪晖等人主编的不定期辑刊《学人》第13期上，刊发《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一文，这可视为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一个起点。之后短短三年之内，汤一介立足《易经》《庄子》等中国典籍，从《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开始，其后发表了二论（《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

<sup>①</sup>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38页。

2000年第2期)、四论(《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五论(《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界》2001年第4期)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汤一介反复提及他发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之后学界出现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解释学本来是西方的学问,已经相当完备,再来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是多此一举;也有学者认为,“创建中国解释学”这个命题值得认真对待,可以就此展开研究,来认真讨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另辟蹊径,开创不同于西方的我们自己的解释学。<sup>①</sup>汤一介认为,后一种立场无论如何是不无裨益的:“即使我们不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解释学来,至少经过我们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也是很有意义的,更何况这样作了之后总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吧!”<sup>②</sup>

2000年,汤一介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中,再度呼吁在比较借鉴西方阐释学的基础上,来讨论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学有无可能。他重提《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指出西方阐释学源于《圣经》阐释,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将“解释问题”作为理论本身来研究,是为古典阐释学的代表;海德格尔完成传统阐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是为20世纪现代阐释学的代表;继而伽达默尔、利奥塔与安贝托·艾柯等人,又进一步开拓西方阐释学的路径。总的来看,汤一介认为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创建中国自己的解释学,有三点应可借鉴。其一,西方固然有根深源长的“阐释”传统,但是阐释学真正发展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问,是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其二,西方早期阐释学,或者说关于“阐释问题”的研究,虽然并不限于经典的阐发,但《圣经》阐释很显然是主体部分。其三,西方阐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联姻彼时的主流哲学,因而出现不同的派别,其阐释理论也各不相同。如是反观中国的阐释学建构,汤一介说:

从这三点看,中国的“解释问题”可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下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一套自己成体系的“解释问题”的理论。同样,中国的“解释问题”也不限于对经典的“解释”,但较之西方,中国的传统似乎更重视经典的解释。当然中国在“解释问题”上也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的,而且往往与当时哲学潮流相配合,甚至在同一时期会有对同一经典的不同解释的派别……我们只有在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有充分了解后,才有可能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sup>③</sup>

不难看出,汤一介主要是在对西方阐释学有大致理解的前提下,来思考中国阐释学的创建可能性的,包括中国阐释学的历史、体系、哲学基础以及其经典阐释的不同路径。同时,汤一介主要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来设想有无可能建构中国自己的阐释学理论。虽然理论本身的构架和形态在他的文章中尚未得到细述,但是这个设想本身,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当代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学界高度评价。汤一介当年的设想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多有启发性。因为以往的中国阐释学研究,大都是按照西方的路子在走,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素材,表面上看在谈中国,实际上是在削足适履,迎合西方理论。故按照这样的路径来构建“中国阐释学”,只不过是西方阐释学多出一根支脉罢了。所以,“所谓中国阐释学,它成立的前提必然不在于这门学科如何被从西方引入,或者能否有效说明中国问题,而在于中国是否有本土性的理论创新”<sup>④</sup>。

事实上,中国的阐释思想源远流长。《易传》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然以后妃之德来诠释《关关雎鸠》的微言大义;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老子的阐释理念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在庄子看来,阐释的要义则在于“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庄子·外物》);

① 汤一介 《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汤一介 《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汤一介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④ 刘成纪 《巫者、歌者与辩者:早期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

郭象主张“寄言出意”(《庄子注》)……在如此丰厚的传统阐释学思想基础上,从汤一介开始到今天,呼吁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学话语的声音不断。要之,建构中国自己的阐释学,这在实践层面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 三、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

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都涉及阐释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追踪中国学者言说这些问题的过程,可以见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坚实脚印。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sup>①</sup>。

阐释学最初被公认是关于《圣经》阐释的学问,换言之,它是各种阐释的方法总汇,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一个例子如圣奥古斯丁多次援引《圣经》中的语录“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他指出这段话不仅出现在《旧约》(《申命记》,25:4)里,同样也两度出现在《新约》里。如保罗就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哥林多前书》,9:9-10)<sup>②</sup>这是说,春种秋收,打场农人凭自己劳动,也有权利分享收成。简言之,在奥古斯丁和圣保罗看来,这里体现出上帝对底层众生的一种人文关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半个世纪之前,在笔者插队的东北农村,马在场上踹黄豆的时候,还是被笼住了嘴,不让他顺口偷吃。可见,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并不是天马行空,无的放矢,而总是具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意义。就方法论而言,阐释意味着去关注文本和话语的言外之音和象外之意,进而提供一套系统的规则、步骤和技巧,尽可能准确地揭示文本的实践意义,以致微言大义。

阐释必然涉及认知,主要是涉及阐释活动中认识的本质、来源、界限以及认识的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究竟是反映了孔子的局限,还是孔子的无奈,抑或它就是孔子心目中不言自明的公理?这恐怕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晓。但无论如何,这句话涉及今天性别理论的认识论问题。又如保罗曾说“男人是上帝的荣光,女人是男人的荣光。”(《哥林多前书》,11:7)<sup>③</sup>这话今天的女性主义者读了,肯定也不会高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之一,是以往的一切经典话语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可是上帝之言又当何论?可见认识论问题在阐释学中至关重要。

伽达默尔认为,在阐释活动开始之前,阐释者脑中必已存在既有的认知视域,是为阐释的“前理解”。唯有将之与文本所蕴含的历史视域互相交融,方能产生新的意义和理解。<sup>④</sup>这其实是典型的后现代观念,对此英国哲学家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在他主编的《牛津哲学词典》中给出的释义:“当历史语境中的作者与同样是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努力创造出某个共享的意义,‘视域的融合’这个隐喻就产生了。这导致阐释永远向再度阐释和再度评价开放,因为不同的意义被投射到相关的作品上面。”<sup>⑤</sup>这样一种创造性的互动,在积极的意义上,突出了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在消极的意义上,便是让一切误解和曲解有了认识论的背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伽达默尔以上关于“前理解”和“效果历史”的论述,可以看作他在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基础上对阐释学作出的方法论回转。海德格尔之前,阐释学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提出本体论阐释学,实现了阐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将理解和阐释看作人类存在的基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② 《圣经·新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3年,第227页。

③ 《圣经·新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3年,第229页。

④ 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⑤ Simon Blackbur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2.

本方式，即理解和阐释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海德格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sup>①</sup>由此推论，语言在本体论阐释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人类正是通过语言来构建并阐释自己的世界。这意味着阐释学从一种单纯的方法和理论，可望被提升到对人类本质和存在意义进行思考的高度，从而成为哲学的基础。

由此也引出阐释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辨。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的张首映教授，在1990年博士毕业之初就曾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张首映开宗明义告诉我们，阐释学是从西方古典解释学演进过来的，沿着人生哲学、现象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样一条进路，最终将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所有相关领域，尽入彀中。至于阐释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定位，张首映的说法是，阐释学在19世纪之前，主要属于认识论，侧重文本的心理分析。终而，有赖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鼎力开拓，使阐释学在现象学的理论基础上，走向了本体论。至此，阐释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分道扬镳。在张首映看来，其标志便是：

(1) 前者追问理解以什么方式存在着，后者讨论存在如何被认识；(2) 前者把理解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后者讨论对存在的认识方式；(3) 前者把理解作为存在状态，后者以为理解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4) 前者从“前理解”“偏见”中进行理解，后者从主体的认识方式对客体进行分析；(5) 前者把阐释作为展开方式，后者通过推导来寻求必然性；(6) 前者询问理解之所以能成为理解，后者关注理解达到什么程度；(7) 前者使理解“世间化”，即存在者从世界之中的存在理解存在，后者使理解心理化；(8) 前者把理解作为个人把握自身存在的可能性的能力，后者把理解作为理性和认识论的工具；(9) 前者以为历史和文化占有了阐释者，后者以为阐释者占有了历史与文化，因而可以肢解历史和文化；(10) 前者像两个一样身份的人睡在地上面对面地对话，后者似一个站着的主体猜着一个跪着的客体的心思并向他讲话。<sup>②</sup>

本体论的阐释学高屋建瓴，具有舍我其谁的王者气派，无疑是张首映的首爱，即便它是如此谦卑。如作者所言，本体论阐释学像两个相同身份的人躺在地面上对话谈心，而认识论阐释学，则好比一个站着的主体揣摩一个跪着的客体的心思，再来跟他说话。这些充满文学色彩的比喻，可以说将本体论阐释学和认识论阐释学孰优孰劣的比较，推向极致。而文学阐释学，在张首映看来，其在根本上无异于本体论哲学阐释学，因为它通过文学阐释的个案，能够揭橥本体论的阐释学精神。甚至可以说，阐释学的哲学本体论，可望通过文学阐释所特有的意境、意象和隐喻等介质，得到更加明白和明朗的表达。是以文学阐释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它的父亲哲学阐释学更具有哲学本体论精神。然而，在经过了过去二十年里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不断冲击之后，我们有必要反思张首映当年的阐释本体论自信。

阐释学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之争，不过是昙花一现。后来在中国学界流行的是阐释学的方法论与本体论之辨。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张江教授在日后收入他《阐释学五辨》一书中的文章《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题》中提出，方法论与本体论应当并重。他认为，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论阐释学到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向，中国未必一定就要效仿。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是不是本体论必然居高临下，高于方法论？其二，是不是西方历经了一个本体论的阐释学转向，中国阐释学便也非要紧跟上一并转向？其三，就建构当代中国自己的阐释学而言，至少就目前阶段来看，我们为什么须设定方法论作为主攻方向？这三个问题很显然并不是四平八稳的平衡策略。实际上张江本人更看好的是方法论：

更彻底的说明是，本体论的研究也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必须以正确的方法论为前提，没有正

<sup>①</sup>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sup>②</sup> 张首映《阐释学的蜕变与本体—目的论的建构——〈文学阐释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1期。

确且不断进步的方法论，本体论研究将失去可能。阐释逻辑的研究，既为阐释提供方法，其思维规则与范式，亦为阐释存在的本体论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一定先进于方法论的提法就是非本体论的。鉴于此，我主张，在中国阐释学建构上，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方法论优先。<sup>①</sup>

应当说张江的判断不无道理。19世纪施莱尔马赫立足方法论，将古典阐释学，特别是《圣经》的阐释传统，扩大到一切类型的文本。阐释学由此走下神坛，成为一切人文学科有望从揭示真理，到揭示历史原初语境和作者原初意义的普遍原则。方法论作为阐释学的历史起点，如上面伽达默尔的立场所示，意味着在当代和历史语境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打破阐释的客观主义幻觉。

#### 四、中国阐释学的汉语媒介

那么，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又面临着哪些问题？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在《中西文论互鉴视域中的中国阐释学建构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阐释学建构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新话题。阐释学也好，解释学也好，诠释学也好，译名虽有不同，表达的知识谱系却是一样的。要之，前辈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阐释学理论。如早在汤一介问路中国解释学之前，就有成中英、周光庆、洪汉鼎等学者提出过类似设想。至于当下如何“建构中国阐释学”这个问题，曾军认为关涉到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厘清。比如，阐释学在中国是不是古已有之？即便它不叫“阐释学”而叫别的名称；中国古代当然有自己的阐释传统，这个传统的当代意义体现在哪里？中国古代的阐释传统，在什么程度和角度上可以与西方阐释学对话？而说到底，曾军认为，假若以中国和西方文论的互鉴作为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前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阐释学的当代语境是什么。

这个语境的核心部分，在曾军看来是汉语。他认为，不论是中国阐释学，还是其他一切中国话语的建构和传播，都应当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今天我们一切理论的建构，都是建立在现代汉语这个载体之上的。换言之，现代汉语是建构中国阐释学抑或一切中国特色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石。因而，我们必须立足于现代汉语的学术思维和表述方式，在中西文化互鉴的语境中建构我们自己的中国阐释学。为此，曾军高度赞赏张江“让阐释学说汉语”的经学疏证“阐释辨”：

张江从汉语的造字法角度，追溯作为单音字的“阐”“诠”“解”“释”等的本义及其引申义，比较各自在理解和分析阐释问题和现象中的优长，进而发掘中国传统中的阐释智慧，并以此来创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基本原理。如他认为无论是“阐释”之“阐”，还是“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所长，互容互合”。<sup>②</sup>

张江近年不遗余力，呼吁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就斐然。其晚近成果之一是20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集《阐释学五辨》。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杨国荣教授为该书作序说“自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观念提出以后，告别模仿、自我做主等表述便一再出现。然而，大致而言，除了慷慨陈词之外，学界真正潜下心来从事创造性研究并致力于学术积累的，却并不多见。在这方面，张江先生对阐释学的‘阐释’，无疑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建设性工作而独树一帜。”<sup>③</sup>张江本人也写了一个序言，题为“让阐释学说汉语”。张江指出，现代阐释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无人质疑其缘起西方，特别是德国，即主要是沿着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脉络，一路发展过来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用汉语的概念、命题和范式，以其为核心来建构一个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体系？对此张江交代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许慎《说文解字》的注解：

① 张江《阐释学五辨》，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161-162页。

② 曾军《中西文论互鉴视域中的中国阐释学建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3期。

③ 杨国荣《阐释学五辨·序》，载张江《阐释学五辨》，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1页。

五年前，在翻看《说文解字注》时，再次看到“阐，开也”的释义，宛如醍醐灌顶，感觉一下打开一个新的思考空间，找到了被我长久忽视的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从汉语汉字的意义本源入手，重新审视有关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发掘潜藏于汉语汉字的思维方式背后的阐释学意蕴。<sup>①</sup>

张江认为，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有两点应说明。首先，阐释学是西学东渐，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之学。但这并不妨碍建构当代中国的阐释学。正如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但并不妨碍今天中国的综合性高校几无例外地都设立了哲学系。张江强调中国的阐释传统和阐释经验其实博大精深，可以上溯到《周易》《诗经》甚至甲骨文。概言之，中国三千年的学术思想和体系，皆由阐释而生成和光大。其次，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并不意味着排斥西方。反之，今天需要有更广大的专业队伍，来从事西方阐释学的研究，唯其如此，中国阐释学的构建方可望得到更为充分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资源。但是张江强调，当代中国阐释学的落脚点，必须是中国问题的当代实践，这是中国阐释学话语创新的根本路径。

## 五、文学阐释学

文学阐释学指的是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理解和批评，甚至是批评本身的批评、阐释本身的阐释，以至于文学阐释学有“元批评”和“元阐释”之称。如前面张首映的文章即从鼎力推崇哲学本体论阐释开讲，而以文学阐释学可以出于哲学而高于哲学的暗示收尾，且该文的副标题就是“《文学阐释学》导论”。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创办了《阐释学学刊》辑刊，栏目有“阐释的张力”“历史的维度”“域外新论”“批评的胜境”四个。而其核心则是文学阐释学研究，兼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美学和西方文学及文论。

讨论当代文学阐释学，李春青教授可谓不遗余力、著述丰厚，频频领风气之先。关于当下的文学阐释学建构，李春青教授指出，“文学阐释学”尚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或方法，事实上迄今为止，它一直处于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之中。具体来说，文学阐释学既不属于那种以审美为核心的韦勒克和沃伦意义上的“内部研究”的文学批评，也不属于那种以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外部研究”的文学社会学。故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阐释学，应当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以文本分析为出发点，进而追问其后面意义生成的主导模式。李春青这样描述文学阐释学的研究对象：

文学阐释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现象，但其研究目标是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整个意义世界。例如图对陶渊明的诗歌，文学阐释学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细读来把握诗歌文本的语言特点、修辞技巧以及风格、意象、韵味等等文学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则需要把这些因素置于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玄学语境以及陶渊明个人身世、遭际等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再进而呈现出陶渊明诗歌包含的复杂的精神诉求、人生志趣以及审美趣味。如此便从一个角度进入到东晋时期的精神空间之中，建构起一个与彼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士族文人群体有所区别的另一种意义世界，从而呈现出一种古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sup>②</sup>

这样一种以整个意义世界为对象的文学阐释学研究，显然是一般的文化与政治角度的文学研究所望尘莫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强项。就此而言，中国自己的文学阐释学建构在面对西方阐释学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李春青的文学阐释学研究也涉及阐释学的方法论与本体论问题，他认为对二者不能做非此即彼的

<sup>①</sup> 张江《阐释学五辨》，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2页。

<sup>②</sup> 李春青《论文学阐释学之学理特征及功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处理。他认为，文学阐释学应该是一种方法论，是关于文学阐释方法的理论概括。例如何为文学阐释、文学阐释如何展开、什么是文学阐释的对象和目标又是什么，等等，都应属于方法论的阐释学。那么，文学阐释学的本体论又当何论？对此李春青的解释是，文学阐释学不仅尝试总结答复上述问题，更关注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问题。这里所说的“意义”，并非追考作者原初的写作动机，抑或复现作品最初的“本义”。他强调说，文学阐释无意追根究底，寻求“定解”。诸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李商隐的《锦瑟》这类其确凿意义迄今未有定解的名作，不可能靠了文学阐释学的名头，就会云开雾散，所有疑问迎刃而解。但是，文学阐释学可以深入《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场景关系、情节走向，以及它的修辞手段和文体趣味，特别是将这些文学要素放到康熙、乾隆时期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里，在跟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与文化力量的互动中，来探究更深一层的意义。如贾宝玉这般光风霁月的人物，在当时意味着怎样的人格理想，以及儒释道三家交汇的价值与审美追求。李春青的结论是，文学阐释学兼具了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特性。作为方法论，文学阐释学可指导读者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具体阅读。作为本体论，文学阐释学可让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文学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彰显文学的特性。

李春青的文学阐释学学理辨析，可以说是已经在让阐释学说汉语了。李春青有意背靠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传统来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他指出，中国古代就有两大阐释传统。一为儒家代表的阐释传统，以弘扬儒家政教伦理为目标，以章句训诂和义理阐发为基本方法。二是道家代表的阐释传统，以顺应自然为理路，以体验和领悟为基本方法。儒家阐释传统追求理解和阐释的明晰性；道家阐释传统相信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简言之，“以道家为代表的阐释传统与儒家阐释传统一样，也同样遵循‘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意义追问路向。所不同的是，道家阐释指向的意义不是关乎江山社稷的政教伦理意义，而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自然之道’”<sup>①</sup>。《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严羽《沧浪诗话》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些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古代诗学和哲学话语，即便我们不把它们叫作阐释学，那又何妨呢？

##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理论方面的自主话语建设，可谓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包括关键词的写作、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正名、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研究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阐释学从哲学到文学，进而成为人文科学所有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国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值得格外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sup>②</sup>由是观之，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当是理论与时俱进，呼应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其丰实成果不仅是中国的，同样也是世界的。

责任编辑：王艳丽

<sup>①</sup> 李春青 《在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道家阐释传统之源流》，《名作欣赏》2022年第19期。

<sup>②</sup>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